



皇后之玺：泥窝窝里抠出的国宝

那一年，孔忠良还是个淘气的少年。他没想到，从水渠边泥窝窝里抠出来的一块“白石头”，竟是件稀世国宝——西汉皇后之玺。

这一幕发生在53年前。

1968年，孔忠良13岁，住在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村。那时的孔忠良，总心心念念着他的“宝库”——离家不远的一段水渠。每天放学后，他都会来到水渠边，拣泡钉子和铜麻钱，这些东西可以给家里换些零用钱。

9月的一天，放学后，孔忠良又来到“宝库”里寻宝，无意间瞥见水渠边的一块石头，“白的，跟大拇指长短差不多，方不方，圆不圆，陷在淤泥里。”孔忠良回忆道。他用力从淤泥中抠出这块“白石头”，抹掉污迹，看到上面刻了字，还蜷卧着一个动物。

这块“白石头”，随后被孔忠良的父亲孔祥发带往西安，转交给文物部门。经专家鉴定，这是刻有四字篆书

“皇后之玺”的皇后印玺，距今已有2000多年历史。

2.8厘米见方，通高2厘米，重33克，皇后之玺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玉色纯净润泽，玺钮为高浮雕的螭虎形。玺台四侧面呈平齐的长方形，刻有长方形阴线框，其内雕琢出四个互相颠倒并勾连的卷云纹。

“这枚玉玺是证明皇后制度的最早文物，也是迄今考古发现的两汉时期等级最高、且是唯一的一枚帝后玉玺。”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忻说。

据《汉宫旧仪》记载：“皇后玉玺，文与帝同，皇后之玺，金螭虎纽。”贺达忻说：“白玉、螭虎，这些都高度吻合汉朝文献中帝后用玺要求。而篆书‘皇后之玺’四字，方正、规范、匀正、充实，是典型的汉代篆书特征，对后期产生了深刻影响。同时文字留白布局合理，堪称引领了后代的印章艺术。”

值得一提的是，这枚玉玺是同时代印章中属于礼制最高、体积最大的。贺达忻告诉记者：“西汉时期没有纸张，印章是被用在封泥上，作为竹简等文件的封印标记，所以相较于后世纸张用印，它的尺寸要小一些。”

那么，这枚玉玺又属于西汉哪位皇后？目前学术界比较统一的观点认为这枚印章是汉高祖皇后吕后所有。当时孔忠良捡到印章的地点位于汉高祖刘邦长陵西边，离吕后陵墓的封土也很近，就是有力的证明。

如今，皇后之玺是陕西历史博物馆的一件镇馆之宝。2010年，博物馆还给孔忠良颁发了证书。

时过境迁，当年捡到印章的少年孔忠良如今已过花甲之年，想起半个多世纪前的捐赠往事，他乐呵呵地笑了：“咱就是个农民，实诚是根本。捡到了宝贝不交给国家交给谁！”

■ 记者 韩啸 杨一苗

这只水牛不怕虎

虎与牛，这对自然界中的猛兽与猎物，却在一件有近3000年历史的文物上“和谐相处”。在陕西历史博物馆，西周晚期青铜器牛尊以牛之口舌为流，其身立一“萌”虎为盖，既庄重大气又意趣盎然。

这件牛尊1967年出土于陕西省宝鸡市。宝鸡是周文化的发祥地，据史料记载，公元前11世纪，周先祖之一的古公亶父率族人迁徙到岐山下的周原，建立了周王朝早期的国家组织。这件文物正发现于宝鸡市岐山县贺家村的一个窖藏坑中，这一区域也是周原遗址的中心。

牛尊通高24厘米，长38厘米，腹深10.7厘米。整体形象为一头身躯浑圆结实、四足粗壮有力的牛。古人在设计这件牛尊时构思精巧：牛嘴微张，轻吐舌头，这里正是青铜尊的倒酒处——流。牛尾弯曲下垂，末端与牛身相连，便成了尊的把手。

据陕西历史博物馆藏品管理部主任贺达忻介绍，我国对青铜器的制造与使用始于4000多年前，兴盛于商代及西周时期。不同时期的青铜器有着鲜明的装饰风格，比如商代青铜器纹饰通常狞厉而神秘。通观这件西周晚期的作品，牛身腹背及足部满饰华美流畅的云纹和夔龙纹，以庄重大气的艺术美感见长。从牛角形状及牛的体态判断，这可能是一头水牛。

最为别致的是牛尊的器盖，牛背上开一方口为盖，盖钮为一立虎，盖与牛背以环钮相连，可随意开启而不脱落。细看这只老虎，身体微躬、立耳垂尾，身上疏疏落落刻着几道斑纹。小老虎“萌”态可掬的样子，又为这件文物增加了不少趣味。

老虎为什么会站在牛身上呢？贺达忻说，在青铜器中，动物造型的尊并不鲜见，这是因为在我国历史上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动物被认为是人与神灵之间沟通交流的媒介，因而常作为祭品进行献祭，一些部族还会将虎、鸟、象等动物作为图腾。这件器物上牛与虎的组合，可能代表着部族间的联合，也可能具有特别的巫术含义，其具体含义还有待进一步研究来发现。

在我国，人与牛的渊源可以上溯至数千年前。自史前的岩画与彩陶开始，我国各个时期的历史文化遗存中，几乎都可以找到牛的形象。从史前捕食野牛，到驯化饲养，再到将牛作为财产象征之一和以牛为农耕文化的主要生产工具，牛一直在人类社会进程中扮演着重要角色。

贺达忻说，从古至今，牛的实用功能在不断发生变化，今天当人们提到牛时，更多会联想到吃苦耐劳的品质和甘于奉献的精神。牛的功能与意象之变，正是人类从为了生存而征服自然，再到与自然和谐相处的见证。■ 记者 杨一苗 侯大明

■ 本版稿件均据新华社

研究揭示3600年前古埃及一法老确切死因

埃及考古学家与医学专家17日发表的一项研究成果表明，距今约3600年的古埃及第十七王朝法老塞格嫩拉应是在与希克索斯人的战斗中被杀害，其头部伤痕曾被木乃伊制作者巧妙隐藏。

考古学家扎希·哈瓦斯与开罗大学医学院教授萨哈尔·萨利姆17日发表在期刊《医学前沿》上的研究成果显示，通过对木乃伊进行CT扫描并重建

二维、三维图像，这两位学者发现，塞格嫩拉双手变形，头部伤痕被木乃伊制作者隐藏在一种防腐材料下，这些伤痕与埃及国家博物馆现存的希克索斯人使用的斧头、匕首等相吻合。

研究认为，塞格嫩拉可能是在战场上被俘，双手被反绑后，被希克索斯人从不同角度多次击打头部致死。研究表明，塞格嫩拉死亡时应为40岁左右。

塞格嫩拉生活在公元前16世纪。

他的木乃伊于1881年被发现，发现时保存状态较差。20世纪60年代，研究人员对其进行了X射线检查，发现他头部曾遭重创。关于他的死因有不同假说，包括在与希克索斯人的战斗中被杀以及在寝殿中休息时被暗杀等。

哈瓦斯表示，CT扫描技术可以更加安全、无创地研究木乃伊，更精准地判断死亡年龄及死因。

■ 记者 吴丹妮 马尔瓦·叶海亚

听，颐和园铜牛说……

在北京西北郊，坐落着大大小小十几座皇家园林和王公大臣的赐园，它们构成了北京西北郊蔚为壮观的园林风景群，这是世界园林建筑史上里程碑式的奇迹。其中一座名叫“清漪园”，后更名为“颐和园”的地方，是我的家。

我，一头铜牛，“出生”于清乾隆二十年（1755年），至今已有266岁，从“出生”起就卧伏于颐和园廓如亭北、昆明湖东堤、十七孔桥东端的雕花石座上，历史跌宕起伏，而我历久弥坚，成为中国古代青铜铸造艺术和水利文化的重要物证。

我为什么会“出生”在颐和园这个地方呢？这得从颐和园的前身——清漪园建园时说起了……

清漪园的“清漪”二字，出自《诗经》：“河水清且涟漪”。清漪园建园目的之一就是兴修水利，将三山五园地区泉眼、水源来路搞清楚，运用引水工程将玉泉山、香山等地水源汇聚到昆明湖。元代时，昆明湖这块儿是水草丰美的低地。可是到了后期，淤泥增多，湖水变少。乾隆时期，将瓮山泊（昆明湖前身）面积扩大两倍，深度挖深了两倍，蓄水量比原来大了很多，改建的人工水库来满足包括通州大运河漕运在内的整个京城用水的需要。

传说大禹治水时，每竣工一处，就铸造一只铁牛沉入水底，好让水不扬波，河道永固。唐朝以后，镇水神牛开始放置在堤岸边。而我就是乾隆皇帝仿效大禹治水时铸铁牛镇水的典故而造，表达了他对昆明湖水利功能的高度重视。

我的背上铸有篆文乾隆帝御笔《金牛铭》，寄托了当时人们对远离水灾的美好愿望。

我在昆明湖东岸朝着西北方向眺望，像是在守望着什么，而西岸是皇家进行蚕织之事的场所。于是不少人赋予了我们“牛郎织女”的传说。其实，乾隆皇帝当时这样安排布置耕织图和我的位置，初衷并没有寓意牛郎织女的想法，后来一再被大臣们穿凿附会，于是自己也就认了。

乾隆四十八年作御制诗《登舟溯游玉河沿途杂咏》中提道：镇水铜牛铸东岸，养蚕茅舍列西涯。昆明汉记不期合，课织重农要欲佳。

我身高1.14米，体长1.75米，身宽0.84米，是由青铜铸造的。从铁牛变铜牛，

这与生产力发展密不可分。乾隆时期赶上经济繁荣，铸造工艺发展，于是本来可以做铜钱的铜用来铸造了我。

别看我是铜铸的，但是我的体态与真牛一样，栩栩如生。当时，我的西侧是浩浩荡荡一池碧波，东侧不远处就是畅春园，而畅春园、清漪园之间是大片稻田。

牛在中国几千年农耕文明中是重要的生产工具，老百姓对我们的感情非常深厚。自从人类发明了照相机，人们便争相与我合影。颐和园工作人员为了更好地保护我，将我周围围上了围栏，还开发了以我为原型的文创产品，让我走进更多人生活里，常伴左右。

■ 记者 徐稚迪 罗鑫 杨淑君

